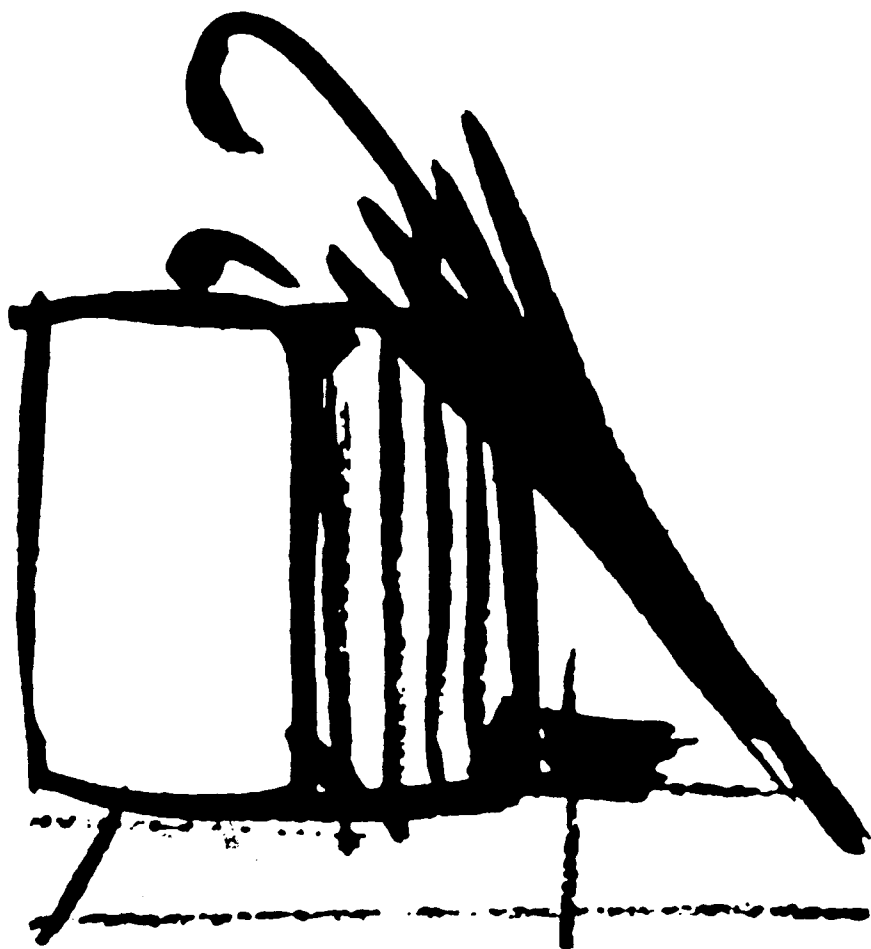


手提箱

ЧЕМОДАН

[美] 谢尔盖·多甫拉托夫 著 刘宪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Ч Е М О Д А Н

| 手提箱



СЕРГЕЙ ДОВЛАТОВ
ЧЕМОДАН

© Sergei Dovlatov 19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提箱/(美)多甫拉托夫著;刘宪平译. - 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 - 02 - 005149 - 9

I. 手… II. ①多…②刘… III. 中篇小说 - 美国 -
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4980 号

责任编辑:温哲仙 装帧设计:翁 涌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手 提 箱

Shou Ti Xiang

[美]谢尔盖·多甫拉托夫 著

刘宪平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5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2

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6000

ISBN 7 - 02 - 005149 - 9

定价 11.00 元

序 言

在签证处,那只母狗对我说:

“离境者每人允许携带三只箱子。这个标准是规定的。内务部有专门的指示。”

尽管反驳也于事无补,我还是提出异议:

“一共三只箱子? 那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办?”

“比如说呢?”

“比如说,我收藏的各种赛车怎么办?”

“卖掉吧。”这个女警官不问究竟地应道。

然后轻皱眉头补充说:

“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,您尽管投诉好了。”

“满意。”我说。

出狱以后,我什么都满意。

“那您就该客气一点儿……”

一周过后,我开始收拾行装。结果,一个箱子就够用了。

对自己竟如此吝啬,我几乎痛哭一场。毕竟是三十六岁的人,

还有十八年工龄,挣了点钱,置办过点家当,想像中,也拥有一点个人财产什么的。可最终仅仅是一只行李箱,而且尺寸不大。难道我是叫花子?怎么会这样破落呢?

藏书怎么办?我收藏的书基本属于禁书,海关不会放行的。不得不把它们连同所谓的私人档案一起分送给朋友们。

手稿呢?早已被我秘密地转移到西方去了。

家具呢?写字台被运进寄卖店,有几把椅子被画家切金拿走了,此前他一直用木箱当椅子坐。其余的东西全扔了。

就这样,我带着一只箱子离去。箱子是胶合板做的,表面包了布料,还有镀镍金属包角,锁头已失灵,只得用晾衣绳捆牢。

这只箱子曾经伴随我参加少先队夏令营,箱盖上有钢笔字写着:小班,谢廖沙·多甫拉托夫。有人并无恶意地在旁边添上:掏粪工。箱面的布料已经有几处破裂。

箱盖内侧粘着一些照片:洛奇·马西阿诺,^① 阿姆斯特朗,^② 约瑟夫·布罗茨基,^③ 着透明服的罗洛布丽吉达。^④ 海关官员试图用手指甲抠下罗洛布丽吉达的照片,结果只划破了表层。

他没有动布罗茨基,只是问这人是誰?我回答说是一个远房亲戚……

五月十六日,我到达意大利,借宿罗马的“迪纳”酒店。这只箱子被塞到了床下。

不久,我拿到了几家俄罗斯杂志开出的稿费,买了一双蓝色皮

① 洛奇·马西阿诺(1923—1986),美国拳击手。

② 阿姆斯特朗(1930—),美国宇航员。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,乘“阿波罗 11 号”宇宙飞船首次成功登上月球。

③ 约瑟夫·布罗茨基(1940—1996),美籍俄罗斯诗人。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

④ 罗洛布丽吉达(1927—),国际著名女影星。出生于意大利。曾在《巴黎圣母院》中饰演女主角艾斯米拉达。

凉鞋、一条法兰绒牛仔裤和四件亚麻衬衣。这个箱子压根儿没打开过。

三个月以后，我辗转到美国纽约。起初住“里奥酒店”，后来搬进位于弗拉辛格的一个朋友家，最终在一处不错的地方租下房子。这次，箱子被搁到了壁柜角落里，连捆箱的绳儿都没解开过。

四年后，我们家团圆了，女儿俨然已是美国人，儿子也出生了，他一天天长大，开始调皮捣蛋。一次，妻子忍无可忍地喊道：

“马上去壁柜里呆着！”

儿子在壁柜里呆了三分钟后被放出来，我问：

“刚才你害怕了吧？哭了吗？”

他说：

“没有。我坐在一只箱子上。”

于是，我才取出箱子，把它打开。

浮头儿是一套体面的双排扣西装，原来是打算穿它接受采访、参加研讨会、讲课和庆祝活动什么的。我以为，还可用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。西装下面是一件府绸衬衣和一双包着纸的鞋；再下面是一件人造毛底的绒布夹克，左边有一顶人造兔毛防寒帽，三双芬兰纱袜子，还有一双司机手套。最后是一条军官皮带。

箱子底上有一页一九八〇年五月的《真理报》，醒目的标题是“伟大的学说永存！”卡尔·马克思的肖像位于整个版面的中心。

我在学生时代就喜欢给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画肖像，特别是马克思。简单勾几笔，已经很像了……

我看看空箱子，布洛茨基在上，卡尔·马克思在下，而位于其间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生活，珍贵无比而又绝无仅有的生活。

我合上箱子。里面响起卫生球沉闷的滚动声。餐桌上堆起五颜六色的杂物。这就是我三十六年的全部，我在故乡生活的全部。我不禁想，难道这真的就是全部？然后自答，是的，这就是全部。

这时,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,往事涌上心头。也许,往事就藏匿于这些破鞋烂衣的褶皱里,现在终于浮出水面。这些回忆可以叫做“从马克思到布洛茨基”,或者“我的积累”,要不干脆就叫“行李箱子”……

一如既往,我的序言又显冗长了。

目 录

序言	1
芬兰绉纱短袜	1
钦差大臣的矮靴皮鞋	15
体面的双排扣西服	29
军官皮带	45
费尔南·莱热的皮夹克	60
府绸衬衣	74
防寒帽	87
驾驶员手套	102

芬兰绉纱短袜

故事发生在十八年前,那时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。

校舍坐落在老城区。河水与石头的结合为这个城市孕育出一种雄伟壮丽的独特气氛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做懒汉,可我却做到了。

这个世界上有精确科学。可见,也有非精确科学。我以为,语文学在非精确科学中当居首位。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了语文系的学生。

开学后一周,一个穿进口鞋的苗条姑娘就爱上了我。她叫阿霞。

阿霞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,这些人都比我们大,有工程师、电影摄影师和新闻记者。居然还有一位商店经理。

他们穿着考究,喜欢下馆子和旅行。其中几个人拥有私家小轿车。

当时,他们在我眼里有魅力、有势力,而且神秘莫测。我真想成为他们的圈内人。

后来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移民了。如今，他们已是步入中老年的标准的犹太人了。

我们过的日子开销很大，经常要靠阿霞的朋友们救济，这令我特别难为情。

记得有一次，趁阿霞呼叫出租车之际，洛格文斯基医生悄悄塞给我四个卢布。

所有人都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，问的和答的，问的和皱着眉愤怒地答的。

阿霞的朋友们从不问她什么。而我一天到晚所做的就是不停地问她：

“你去哪儿啦？在地铁里和你打招呼的那个人是谁？你从哪儿弄来的法国香水？……”

大多数人认为，问题解决得不合意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尽管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实答案，可还是问个没完……

简而言之，我这个人遇事纠缠不休，不明事理。

我有了债务，它们呈几何级数的速度递增，到11月份已经八十卢布。那个年代，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。

我知道什么是典当铺，那里的收据、排队等候、穷苦而悲伤的氛围。

阿霞在的时候，我可以不去想这件事。只要我们一分手，欠债的念头就会像乌云那样翻滚上来。

我每天都在灾难感中醒来，几个钟头躺在床上，没有心思起床穿衣，我甚至当真地盘算过如何打劫珠宝店。

我深信，穷小子坠入情网后，任何一个念头都能构成犯罪。

那时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。阿霞本来就是落后生。在系主任办公室人们开始谈论到了我们的精神面貌。

我发现，恋爱的人一旦背上债务，其道德面貌便成为人们议论

他的话题。

简而言之，一切都糟糕透顶。

一次，我在城里东游西荡，摸六个卢布。我急需去当铺购买一件冬季外套。当时碰巧遇上了弗雷德·科列斯尼克夫。

他叼着烟，胳膊肘靠在叶利谢耶夫商店大门的铜把手上。我知道他做投机买卖。是阿霞介绍我们认识的。

这个年纪二十三岁上下的小伙子，高高的个子，肤色不大健康，说话时总是神经质地抚弄头发。

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：

“可不可以在明天之前借你六个卢布？”

我向来以有一搭无一搭的口气张口借钱，这样，也便于别人拒绝。

“小儿科。”弗雷德说着掏出一个小小方皮夹子。

我后悔没多要点儿。

“多拿点儿吧。”弗雷德说。

我竟像个傻瓜似的谢绝了。

弗雷德好奇地看看我。

“咱们吃饭去吧。”他说。“我想请你一顿。”

他神情自然，看不出有什么意图。我向来羡慕这样的人。

我们穿过三个街区，来到“海鸥”餐馆。大厅里空无一人。服务员围坐在侧面的一张桌旁抽烟。

窗户四敞大开着，风吹得窗帘摇曳不定。

我们决定坐到远处的角落。这时，一个穿银白色涤纶夹克衫的青年拦住了弗雷德。他们进行了一场颇令人费解的对话。

“您好。”

“您好。”弗雷德应道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都没有。”

年轻人失望地扬起眉毛。

“一点儿都没有吗？”

“绝对。”

“我可是朝您要过的。”

“我深表遗憾。”

“还能指望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最好在一周内。”

“尽量吧。”

“有保证吗？”

“不可能。但我会尽力而为。”

“这次会是大公司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那就这样。请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您还记得我的电话吗？”

“抱歉，记不得了。”

“请记一下吧。”

“很乐意。”

“尽管这事不能在电话里谈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能不能直接带货来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地址还记得吗？”

“恐怕……”

等等。等等。

我们走到远处的角落里。台布质地粗糙，熨斗留下的条痕清晰可辨。

弗雷德说：

“提防那个公子哥。一年前他在我这订了一批‘十字架’……”

我打断他的话：

“十字架是什么？”

“手表。”弗雷德说。“这无关紧要……我把货带来过大约十次，他都没有要。每次都有借口想出来。简单说吧，到了也没买。我一直琢磨这是什么把戏？突然弄明白了，他根本没想买我的‘十字架’，他只是想体验一下，做个订购一批正宗货的商人有什么样的感受，他就是想没完没了地问：‘我要的那货怎么样了？’……”

女服务员记下我们点的菜。大家抽起烟，我好奇地问：

“您会不会坐牢啊？”

弗雷德想了想，然后平静地答道：

“有可能。”又并不愤恨地补充道：“不过是被自己人出卖。”

“或许，你跟他们断绝关系呢？”我说。

弗雷德皱起眉头：

“我曾经做过发货员。每个月靠九十卢布生活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欠欠身子，出人意料地吼道：

“这丑恶的把戏！”

“坐牢好不到哪去。”

“有什么着呢？我没本事。又不愿被九十卢布弄得狼狈不堪……好吧，就算我一生能吃两千张肉饼，穿破二十五套深灰色西装，翻看七百期《星火》杂志。也就如此吧？在地壳上没挠上一道就该咽气了？……宁可活上一分钟，但得真正有人样地活！……”

这时，饭和酒送上了来了。

我的新相识仍在不着边际地发表高论：

“我们降生之前是深渊，我们死后还是深渊。我们的生命只是冷漠无情的苍茫大海中的一粒沙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不让沮丧和忧郁的情绪冲淡哪怕这一瞬间！要在地壳上挠上一道。让讲人道的平庸人去做苦差事吧。反正平庸人不会建立功勋。他们甚至不会犯罪……”

我差一点儿冲他喊起来：“您就这么立功吧！”但忍住了，毕竟他掏酒钱。

我们在餐厅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后来我说：

“该走了，典当铺要关门了。”

这时，弗雷德·科列斯尼克夫提议说：

“想入伙吗？我做事很小心，外汇和金子不接。您就给我料理一下财务方面的事情吧，这事儿也可能发它一笔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签签字……现在我们喝掉酒，事情明天再聊……”

第二天，我一度觉得弗雷德要耍人。然而，他仅仅迟到了一会儿。我们在“阿斯托利亚”饭店前停用的喷泉附近会面后，朝灌木丛走去。弗雷德说：

“一分钟以后，有两个芬兰女人带货过来。叫辆出租车，和她们去这个地方……我们相互称您？”

“称你得了，随便点，客气什么？”

“那你叫辆车就照这个地址去。”

弗雷德塞给我一块报纸，接着说：

“接你的是雷马里。很容易认。他有一张白痴的脸，穿橙色高领绒线衫。我十分钟以后过去。一切都会 OK！”

“我可不会说芬兰话。”

“这没关系。重要的是——微笑。要不我就自己去了，可别人认识我……”

弗雷德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：

“瞧，她们在那儿！行动吧！”

说罢便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我胆战心惊地迎着那两个女人走过去。她们很像农民，宽脸庞晒得黝黑，身着浅色风衣，头戴鲜艳的三角巾，脚蹬雅致的便鞋，每人拎着一个家用提包，圆鼓鼓的好像塞了足球。

我使劲比划着，总算把女人带到了出租车站。没人候车。我没完没了地重复着：“弗雷德先生……弗雷德先生……”并且不断捅着其中一人的衣袖。

“那家伙呢，”一个女人突然起急了，“他躲到哪里去了？为啥蒙我们？！”

“您讲俄语？”

“你大婶我本来就是俄罗斯人。”

我说：

“弗雷德先生要晚一点儿来。他让我领你们去他家。”

车来了。我说出地址，开始向窗外张望。我不信行人当中会有那么多便衣警察。

两个女人用芬兰话交谈，她们显然不满意，后来笑起来，我才轻松下来。

一个穿橙色高领绒线衫的人在便道上等我。他使个眼色说：

“臭丫挺的，来啦！”

“你看看自己那德性，”年纪轻一点的伊洛娜生气了。

“她们讲俄语，”我说。

“太好了。”雷马里没有丝毫难为情。“棒极了。这便于我们亲近。你们喜欢列宁格勒吗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玛丽亚说。

“去过埃尔米塔什了？”

“还没有。在哪里?”

“过去沙皇住的地方,现在里面有许多油画、纪念品什么的。”

“应该看看。”伊洛娜说。

“你们竟没去过埃尔米塔什!”雷马里有些难过。

他甚至放慢了脚步,仿佛不乐意同这样没文化的女人打交道。

我们来到二层。雷马里推开一扇没上锁的门。屋里到处堆放着器皿,四壁挂满肖像照片,沙发上是色彩鲜艳的进口唱片袋。床铺还没收拾。

雷马里打开灯,迅速收拾了一番,然后问道:

“带什么货来了?”

“最好回答我们,你带钱的朋友在哪儿?”

这时响起脚步声,弗雷德·科列斯尼克夫出现了。他手持刚从报箱取出的报纸,神态自若,甚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他用芬兰语对客人说:“你们好!”

然后转过身朝雷马里吼道:

“你这丧门星!骚扰她们了吧?”

“我?!”雷马里愤慨了。“我们谈的是美好的话题。她们讲俄语。”

“很好。”弗雷德说。“晚上好,莱娜尔女士,过得怎么样,伊洛娜小姐?”

“谢谢,还可以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隐瞒自己会讲俄语?”

“有谁问过我们?”

“首先应该喝一杯。”雷马里郑重地说。

他从立柜取出一瓶古巴罗姆酒。芬兰人高兴地一饮而尽。雷马里再次斟满。

趁客人去方便之际,雷马里说:

“全是短袜，一模一样的。”

“还有，她们俩是亲姐妹。”弗雷德说。

“我也这么想……不过，莱娜尔女士那张脸叫我信不过。”

弗雷德冲雷马里吆喝道：

“除了侦查员的脸，有谁的脸让你信得过了？”

芬兰人很快就回来了。弗雷德递上干净毛巾，她们举起大高脚杯时笑了。这是整整一天里芬兰人第二次笑。

她们把家用提包放在膝盖上。

“乌拉！”雷马里说，“为打败德国佬干杯！”

我们一饮而尽，芬兰人也不甘示弱。地板上立着一台收唱两用机，弗雷德用脚触动开关。黑色唱片轻轻旋转起来。

“你们喜欢哪个作家？”雷马里开始讨芬兰人嫌了。

女人商量了一番后，伊洛娜说：

“可能是卡尔亚莱宁^①吧。”

雷马里宽容地笑笑，以示认同客人的见解，但他原本指望一个更有名望的。

“明白了。”他说。“什么货？”

“短袜。”玛丽娅回答。

“没什么别的了？”

“你原来想要什么来着？”

“什么价？”弗雷德很有兴趣。

“四百三十二卢布。”年轻一点的伊洛娜口齿清楚地说道。

“上帝啊！”雷马里大叫。“资本主义大张狮子口了！”

“我想知道有多少双？”弗雷德制止住他。

① 卡尔亚莱宁(1923—)，一九六二～一九六三、一九七〇～一九七一年两次出任芬兰总理。曾多次出任外交部长，中间党党员。